

引　言

中国古代财政制度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如果从夏王朝算起，至今也已有四千多年的历史了。时间既长，内容自丰。古人讲财经，总是说“洪范八政，食货为先。”相传西周建立之初，周武王曾向归顺周朝的商代贵族箕子询问治国大法。箕子提出“一曰食，二曰货。”从此“食货”一词成了“财经”的同义词。[19] 世纪末，我国还有人将西方经济学名称译为“食货学”。

对于古代财经的描述和研究，最早见于《尚书·禹贡》，然后是《史记》中的“平准书”和“货殖列传”；班固编写《汉书》，创立《食货志》，以后各代正史中都有《食货志》专章。此外，在典章制度、人物列传以及各代学者的著作中，也有以不同形式记录下来的许多财经史实。

中国古代财经史，纵贯数千年，史料纷繁，头绪众多，涉及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各类收支，各种财经类著作，或是单一财经制度的研究，或是某一朝代财经状况的介绍，对一般的读者来说，似乎过于专业化了。本书按照“博观约取”的要求，将古代较为重要的一些财经制度分门别类，扼要而述，以便读者能够不必化费过多的时间，就可以对古代财政制度的来龙去脉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当然，本书的这一努力是否成功，尚有待读者的裁决。



第一章　量入为出

古代国家的财政支出，主要是皇室费用和军政费用。秦汉以前“公”(政府财政)“私”(皇室财政)不分，皇室费用是国家支出的大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左右丞相之下设立了掌管租税收入和政府开支的“治粟内史”，又设立了掌管官府手工业和山海池泽收入以供皇室需求的“少府”。一般认为，少府的设立是划分公私财政的开始。但是，封建专制皇权支配下的财政收支，最终还是必须服从君主的意愿。因此，在相当多的时候，公私的划分，只是一句空话“化公为私”“挪用公款”，满足君主的奢侈浪费，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

我国古代一些有远见的政治家早就清楚地看到，社会所能提供的剩余生产品是有限的，如果不对统治者的欲望加以约束，就会危及国祚。商的灭亡，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周代规定宰相管理国家财政，在每年粮食收获完毕之后，根据年成

的好坏,留出一定的储备,再“制国用,量入以为出”。量入制出是以节用为财政支出的最高原则，在古代乃至中世纪都被视为国家财政的金科玉律。周公在总结周文王享国五十余年的经验时,把文王的“卑服”“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之类的俭省举止，作为治国的楷模。必须指出，量入制出只是消极地顺应收入的现状，而不是积极地运用国家的财政支出去发展生产，推动社会进步，是一种不甚全面的理财观。但俭省、节用,相对于骄侈、淫靡来说,不失为一种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财政政策，有利于统治者长治久安，这就是量入制出的财政思想能在中国长时期占据主导地位的政治原因。

第一节　　皇室支出

皇室支出,指皇帝、后妃、太子、公主、宗室等皇室成员的衣食住行、婚嫁、娱乐、赏赐,乃至出家入道、求仙拜佛等五花八门的开支。皇室消费集团尽管绝对人数不多，但消费能力却是惊人的。“朕即国家”,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国家财政分配中，当然也必须唯皇帝的马首是瞻。取之于民，用之于君，举天下奉一人，这是古代财政支出的主要特点。

皇室支出的多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君主的个人品质和一时好恶。司马迁在《史记·孝文本纪》中说,汉文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他曾经想建造一个露台，工匠计划匡算后，说需要花费百金，相当一般人家十家的家产，于是就作罢。文帝常常穿着粗布衣服,规定后宫妃嫔穿着衣不得曳地,帏帐不得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但在封建社会中,像汉文帝这样在生活中

能自我约束的君主可谓凤毛麟角，绝大多数是纵欲豪奢、挥霍浪费。唐太宗李世民在即位之初，鉴于隋之覆辙，慎于兴作，务求俭约，后来也渐趋奢纵。贞观二十二年，他自我评价道：“吾居位以来，不善多矣。锦绣珠玉不绝于前，宫室台榭屡有兴作，犬马鹰隼无远不致，行游四方，供顿烦劳，此皆吾之深过。”封建社会的“明君”尚且如此，等而下之者，可想而知。君王开支的随意性和不可控性，是许多朝代财政收支难以平衡乃至恶化的主要因素。

一、从慈禧的食谱说起

光绪朝的一个太监写了一本《宫廷琐记》，在这本书中他提到慈禧的一份食谱，共计有：

火锅二品：八宝奶猪火锅，酱炖羊肉火锅；

碗菜四品：燕窝万字金银鸭子，燕窝寿字五柳鸡丝，燕窝无字白鸭丝，燕窝疆字蘑鸭汤（含“万寿无疆”之意）；

杯碗四品 燕窝鸡皮串鱼脯丸子，鸡丝煨鱼面，木樨肉，炖海参；

碟菜六品 燕窝炒炉鸡丝，蜜制酱肉，大炒肉焖玉兰片，肉丝炒鸡蛋，溜鸡蛋，蘑炒鸡片；

片菜二品 挂炉鸡，挂炉鸭；

饽饽四品：白糖油糕寿意，立桃寿意，苜蓿糕寿意，百寿糕；

随克食（小吃）一桌 猪肉四盘，羊肉四盘，蒸食四盘，炉食四盘。

此外，还有鹿脯、鹿胎、山鸡、熊掌、芦雁、天鹅、地鹚、哈司蚂之类的野味十多种。

清代帝王每日早晚两顿正餐，两次小吃。皇宫每天用肉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500 斤,鸡鸭 100 只。皇帝每日的膳食费是白银 50 两,可买大米数千斤。所以民间传言“:帝后一席饭,农民半年粮。”

为了伺候皇帝吃,宫中有‘御膳房”,由内务府管理,设管理事务大臣、尚膳正、尚膳副、尚膳、主事、委署主事、笔帖式等官员,具体负责皇帝的吃饭事宜。慈禧时,专为她做饭的“寿膳房”有八个大四合院,光炒菜的厨师就有 84 人,做茶食点心、奶制食品的也有 30 多人。传说有一天慈禧在北海静心斋歇凉,忽听大街上有打铜锣的声音。慈禧问是干什么的?当差的回禀是卖豌豆黄、芸豆卷的。慈禧便叫人把打锣的叫进去,尝了他做的点心,连说“:好吃,好吃!”从此,这个卖豌豆黄的人就被留在宫中专为慈禧做点心。

清宫的饮用水专门‘取之玉泉山”。乾隆在《荷露煮茗》一诗的小序中说“:水以轻为贵。’他曾谕令制银斗一个,用来盛水,以水之轻重来评定全国各地水质的高下。“扬子江心水,蒙山顶上茶”在茶界被称为双绝。但乾隆评定结果,北京玉泉山水斗重一两,塞上伊逊河水与之相同。济南珍珠泉水和扬子江中水斗重一两二三厘。无锡惠山泉、杭州虎跑泉更重。“轻于玉泉者惟雪水及荷露云”。因此,清宫每天派专人专车从玉泉山运水,宫内饮用、煮饭、烧菜、酿酒全用玉泉水。皇帝出京巡幸,亦‘载玉泉水以供御用”。乾隆在承德避暑山庄时,要夫役们每天清晨为他一点一滴地汲取荷叶上的露珠,以供煮茗烹茶之用。他曾为此作诗云:“平湖几里风香荷,荷花叶上露珠多。瓶罍收取供煮茗,山庄韵事真无过。”帝王的“韵事’是不作‘成本核算’的。

“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这是唐朝诗人杜牧笔下对帝王为满足一己的

口腹之欲而不惜劳民伤财的描述。毫无疑问，这种情况并非个别的现象。乾隆的《荔枝诗》说“：缀枝颗颗露华鲜，闽峤飞来路六千。”从“六千里”外的福建跋山涉水送来的荔枝，到皇帝手中仍然是“颗颗露华鲜”；在没有航空，保鲜技术也不发达的古代，其代价是不言而喻的。据《回部四果图跋》所载，驻新疆的大臣，每年都从驿站将木瓜、石榴、苹果、梨等飞驰送京。从广东运来的是龙眼和甘蔗。乾隆“颁赐群臣，及内庭翰林，亦岁以为常”。

如果说帝王的吃不仅仅是为了果腹，那么帝王的穿更远远超过了御寒的功能。冠服历来是我国礼仪法规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表明身份，区别等级贵贱的重要标志。以清代为例，皇帝的服装就有衮服、朝服、吉服、常服、行服、雨服等。

帝后宗室的冠服，也同样种类繁多，而且价值昂贵，如清代皇后的朝冠，顶分三层，贯穿东珠各一颗，均承以金凤，每一金凤饰以东珠三颗、珍珠十七颗，衔大东珠一颗。朱纬四周缀以金凤七只，每只金凤饰东珠九颗、猫眼石一颗，珍珠二十一颗。冠后绣有金翟一只，饰猫眼石一颗、珍珠十六颗。翟尾垂珍珠三百零二颗，五行二就，每行有大珍珠一颗。冠后护领垂有明黄绦二条，末缀宝石，带有青缎。据上述可知，皇后的这顶凤冠计用金凤十，金翟一，东珠七十八，珍珠五百十六，猫眼石八。现故宫博物馆乐寿堂就陈列有这样一顶凤冠。又如唐中宗的女儿安乐公主的一条裙子，上面的花卉鸟兽，“皆如粟粒，正视旁视，日中影中，各为一色”。据说价值一亿钱。唐正一品官员月俸三万一千钱。安乐公主的这条裙子相当宰相级大臣三千二百个月的月俸！对百姓更无异是一个天文数字了。

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绫罗绸缎,用的是奇珍异宝。据史料记载，清同治时养心殿内有各种陈设七百二十四件，大多是旷世稀珍。宁寿宫慈禧的膳房中，有餐具一千五百多件，其中各种金餐具合计重五千八百两，银餐具重一万两。避暑山庄有定窑、均窑和景德镇等名窑特制的名贵瓷器十二万件。行宫如此，紫禁城中更可想而知。

在紫禁城的许多宫殿中，还有不少紫檀木的家具。在太和殿正殿东西两壁昆庐帽门口之南，各有一件紫檀木雕龙大柜,高 3.70 米,比一般房间还高,面宽 2.18 米,深 0.80 米。紫檀木是世界上最名贵的木材品种之一，主要产于南洋群岛，我国的广东、广西也有出产，但数量不多。紫檀树生长缓慢，要数百年才能成材，木质极为坚硬、沉重，为皇室所爱重。明代因为国内紫檀木资源很少，曾派官吏赴南洋采办。清代所用紫檀木料，主要是明代存料。乾隆时紫檀木按斤论价，每斤白银二钱一分。据说拿破仑墓前有一个仅仅五寸长的紫檀木模型,已令人惊羡不已。清宫之中,除太和殿外,乾清宫、养心殿都有大型紫檀木龙柜，紫檀木制作的屏风、宝座、几、案也很多，颐和轩、乐寿堂等宫殿的门框都用紫檀木包镶，其殿内高大的隔扇门甚至是用纯紫檀巨料制成。

清初皇室日常支出,以皇庄等收入为主要来源,当时皇庄共占地 13270 顷。当供求不平衡时，还要取诸户部，乾隆时曾规定岁支银六十余万两。康熙在四十九年（1710 年)的一则上谕中指出,清初的宫廷费用尚称俭约,说‘ 明朝费用甚奢,兴作亦广,一日之费,可抵今一年之用 其宫中脂粉钱四十万两，供应银数百万两，……明季宫女至九千人，内监至十万入，饭食不能遍及,日有饿死者 ”。以上所述,未必可信,但即使清初

宫廷费较俭省，以后也渐趋豪奢。

乾隆六年(1741年)，为庆祝乾隆生母崇庆皇太后五十寿辰，乾隆组织八旗官员、兵丁男妇、太监人等年在六十以上者自西安门至紫光阁各按旗分次序,男左女右,分列道旁“瞻仰跪接”。这一天，仅赏赐一项就开销白银十万余两，缎布七万多匹。然而，与后来崇庆太后盛大的万寿庆典相比，这次祝寿几乎不值一提。皇太后六十寿辰时，乾隆指令内务府、各省督抚及在京王公大臣在西直门至西华门沿路，“各按段落，预备经坛、戏台之类”。乾隆十六年(1751年)十一月二十日这一天,十余里长的道路上,几十步就有一个戏台“锦绣山河,金银宫阙,剪彩为花,铺锦为室,九华之灯,七宝之座,丹碧相映,不可名状”。对于这样阔绰的铺陈，连皇太后本人也认为“殊显繁费”。但此后皇太后七十、八十庆典,仍然照旧分段布置。乾隆二十六年还专门拨款一百多万两白银将西直门至西华门一带街道铺面统一修葺，“俾令整齐可观”。乾隆本人的历次寿庆典也是越过越排场。至于慈禧挪用海军经费五百多万两整修颐和园,以备庆祝六十岁的‘万寿节”,更是妇孺皆知,无须赘言了。

二、乾隆皇帝下江南

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个皇帝统治的一百多年时间，史称‘康乾盛世”。三个皇帝中,雍正在位13年,康熙、乾隆执政都不下60年,其时间之长、影响之深,在中国历史上是极其罕见的，因而关于他们的传闻轶事特多，其中有一则故事说乾隆是海宁陈阁老之子，为了探访本生父母，特地借六次下江南之机四次临幸海宁陈家，并以人子事父母语气为陈宅书写了爱日堂、春晖堂两块匾额，云云。此传说在清末民初几乎是家喻

户晓,童叟皆知,并成为后世小说、戏剧、电影‘戏说’乾隆的绝妙素材。

乾隆身世的传闻当然是无稽之谈，但他四次临幸海宁陈家确有其事，不过不是省亲而是为了视察海塘工程。江南是全国财赋重地。魏晋以后，随着江南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其在国家财政中的地位也日益重要。唐代大文豪韩愈说：“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还有人说,唐宋以后‘国计咸仰于是”。雍正二年,沈德潜在《浮粮变通议》中指出“:苏松之田居天下八十五分之一,而所出赋任天下十分之二。”康熙曾六下江南。乾隆从十六年(1751 年）至四十九年(1784 年）也对江浙地区进行了六次巡幸，目的都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

帝王出行,又叫出巡、巡幸、巡狩,是一件大事。据《故宫掌故》一书介绍，清代皇帝“行前都要颁诏全国，减免沿途田赋。向导官要先行，督饬沿途地方官整修道路，准备供应，安排行宫。临行前还要到奉先殿，向列祖列宗牌位辞行。启程当天,皇帝换穿行服,在盛大的卤簿仪仗、乐队夹道欢送中,乘马出午门，留京王公大臣要到午门外跪送。随行的王公大臣和卫队前导后拥，形成一支人马众多、浩浩荡荡的出巡队伍。每到一地停留，行宫都要事先安排好，当地官员乡绅都要到城外跪迎、跪送”。清代的皇帝中,康熙与乾隆出巡的次数最多。据统计，乾隆在位期间，各种巡幸活动不下 150 次,以至有人说他是‘一日不肯留京’的‘马上朝廷”。

帝王的行，不是小事。皇帝离京，犹如朝廷搬家，百官随从，军队护卫，百姓修筑道路，供应食宿。乾隆出巡时曾借住怀柔大财主郝氏家中，每天仅皇帝和随从们的吃饭，就“费至十余万”。正像《红楼梦》中所说的那样,接驾一次“,银子像水

一样的淌”。一生喜好出巡的乾隆，不知耗费了多少民脂民膏，当然也给国家带来沉重的财政负担。

三、从阿房宫到十三陵

人，都有一个家，都想要一个舒适的家，帝王也不例外。不过，帝王的居所被称作宫殿，不仅是生活的场所，还是国家政权活动的中枢。因此，帝王之居除了要满足舒适奢华的生活要求之外，还要体现皇权的至尊，一般都是高台重檐，层层门殿，步步高深，前后排比，左右对称，加上金、银、铜、铁、玉石，琉璃的雕饰，充分显示其雄壮和华丽。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将六国宫室画成图形，在咸阳依样仿造。从咸阳的雍门以东至泾水与渭河的交汇处，修建了一百多处离宫别馆。史称“殿屋复道，周阁相属。所得诸侯美人钟鼓，以充入之”。秦始皇还嫌原来的朝宫太小，为炫耀其威严，又造阿房宫，“东西五里，南北千步”。朝见百官的前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宫殿前立十二个铜人，每个重二十四万斤。用磁石作大门，预防有人暗藏铁兵器入宫行刺。阿房宫的规模之大，是夏、商、周以来所罕见的。秦朝的宫殿，累计关中有三百多所，关外行宫四百多所，所耗费的财物无法估计。秦亡，项羽入关，焚烧秦宫室，大火三月不熄，一代名宫就此化为灰烬。后世史家指出，秦因造阿房宫而耗尽天下财力，是导致其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北京的明清皇宫是历朝宫殿保存至今最完整的，现称故宫，始建于明永乐四年(1406 年)，永乐十八年(1420 年)基本建成，以后各朝继续有所营建，逐步形成如今所见的规模。明清皇宫，又称紫禁城，占地 72 万平方米，有宫殿、廊庑和各式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建筑九千多间,殿宇巍峨,宫阙重叠,画栋雕梁,气象万千。

明永乐年间始建紫禁城时，从全国各地征调各种工匠和民夫到北京轮流服役，每次工匠十万，夫役百万。建造宫殿的木料,明代大多采用云南、广西、贵州、四川等地的楠木,清代多取自东北长白山等地的松木。明永乐时派遣工部侍郎刘伯跃到西南采办大木，仅湖广一省就费银三百三十九万两。紫禁城墙的城砖由山东临清等地专门烧制。宫殿室内铺设地面的金砖，由江南苏州等五府承造。所用石料，分别采自北京房山县的汉白玉石，河北蓟县盘山的五色虎皮石和曲阳县的花冈石。宫殿外墙的红色涂料产自山东鲁山，加工在博山。宫殿内墙的杏黄色料叫色金土，是河北宣化的产品。紫禁城的建造与以后历朝的营修，究竟化了多少经费，现在已经无从考察。现知乾清宫共耗银二千余万两，役匠三千多人，岁支食米一万三千余石。明正德九年（1514 年),乾清宫遭火灾,为了支付修复工程的费用，朝廷下令全国加赋银一百万两，以供开支。其余各宫殿的修建费用可以此类推。

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古人相信人死后灵魂不灭，要到另一个世界去生活。因此，帝王不仅在活着的时候要修建富丽堂皇的宫殿，还要为死后的享受准备豪华的陵墓。

我国帝皇陵寝的基本格局是由秦始皇确立的。秦始皇即位后，就选定了骊山北麓营建自己的陵墓。征发役徒七十多万人，前后共用了三十八年，所耗费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是惊人的。晚清魏源在《骊山》一诗的自注中说，骊山除了温泉之外,并无奇特之处;“而一笑倾周(指西周褒姒),一浴败唐(指唐玄宗与杨贵妃),一葬亡秦”。

汉代，皇帝即位一年后修陵。陵址由皇帝亲自选定，每年

用天下贡赋的三分之一作为修陵的费用。唐代皇陵，大多“因山为陵”，选择自然高耸的山峰，绕山筑城，再从山腰开凿山洞,通向主峰下面,修筑地下宫殿。“因山为陵”的首创者是汉文帝，原意是不必封土，减少支出。但实际上在山中开凿地宫，建陵垣，造房舍，修寝殿等的工程量及开支并不少于封土造陵。

历代皇陵中，明十三陵以明朝十三个皇帝的陵墓集中在同一陵园内而享有盛名。十三陵位于北京昌平的天寿山下，从明成祖永乐七年(1409年)开始营建长陵至1644年明朝灭亡，十三陵的营建工程历经二百多年，从未间断，所耗的经费极其庞大。

明成祖长陵的祾恩殿。全部为楠木结构，是国内最好的楠木大殿，其精美的造型和宏伟的气势丝毫不亚于故宫的太和殿。殿中最大的四根巨柱直径一米以上，二人不能围抱。这些巨大的木料都是从西南各地深山老林中砍伐来的。一根巨木从砍伐到运进陵园要五、六年时间，许多民夫为此而丧命,当时有“入山一千,出山五百”之说。

明世宗永陵明楼全部用石料筑成，在十三陵中是绝无仅有的。永陵明楼所用的花斑石全部采自河南浚县善化山，石质异常坚硬。从永陵建成至今四百多年，棱角还像新琢一样。十三陵所用的石料大多是巨石。定陵地宫三座大殿的六扇大石门,每扇门高3.3米,宽1.7米,重约4吨。据记载,从百里之外的房山运一块长3丈、宽1丈、厚5尺的大石料到陵园，前后需要动用民工2万多人,拖运28天。一些产地较远的巨石,还要在沿途打井,等到冬天,汲水泼成冰道,在冰上纤运。老百姓称这些井叫“万人愁”。

明神宗万历皇帝的定陵，今已发掘。据《地下宫殿——定陵》一书介绍"为造定陵"船只像穿梭一样,从山东临清沿着通惠河运来了大量的'寿工砖'。从房山采运大量的石材。花斑石来自河南浚县，甚至封土都要从十几里路以外运来"。"为了使明楼更加坚固，还浇灌了铁汁"。定陵建于万历十二年,竣工于万历十八年,历时六年,费银八百万两。

明世宗嘉靖皇帝的永陵修了十二年，每月费银三十万两，在十三陵中役使人力最多，建造时间最长，耗费最大。永陵建成后，"壮丽已极，为七陵所未有"。但嘉靖看了以后还不满意，问主持建陵的工部大臣："我的陵修到这样就算完了吗？"见皇帝发怒，工部大臣在仓促之中回答："还有一道外罗城没有修。"嘉靖是满意了，但从此明皇陵的建造中又多了一项外罗城的支出。嘉靖时，国家银库每年岁入约二百万两，而修永陵每年就要支出三百多万两。明中后期，国家财政每年要亏空二、三百万两,皇室的糜费,包括营建陵寝的支出,是明政府财政拮据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迟到的马寅初

马寅初是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人口学家。他认为人的繁育必须同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相适应，曾提出以节制生育，提高人的质量为中心的"新人口论"。可惜，马寅初的这一主张同'人多好办事'的观念不无矛盾,当然更不可能为具有'多子多福"传统观念的人们所接受。

血浓于水。在具有强烈家族观念的中国古代社会，权力和财富的分配，与人们之间的血缘亲属关系的亲疏密切相关。一个家族得了天下，皇族成员理所当然要共享胜利成果。周武王灭商后分封诸侯，"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

四十人 ”。

周的分封制是天子将土地以及附属于土地上的 “ 民 ” 直接分配给王室成员。诸侯‘ 封土领民 ”,作为王室的拱卫,抑制潜在的敌对势力，依靠血统来维系中央与地方的联系。诸侯受封土地的出产以及附属于土地的 “ 民 ” 的力役，是他们的收入来源。另一方面，诸侯也要定期将收取的一部分庄稼、牲畜、狩猎所得的猎物以及本地的土特产等作为贡纳献给天子。分封与贡献，是周代天子与宗室成员之间财富分配的主要形式。

事物的发展，往往与人们原先的设想大相径庭。封土领民的分封制使诸侯拥有很大的权力。权力的追逐导致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割据与混战。原本作为王室拱卫的各诸侯国结果成了周朝的掘墓人。秦统一后，取消分封制，实行郡县制，这是一个伟大的创举。

新生事物的成长总是曲折的。秦失其鹿，楚汉相争。韩信、彭越、英布等协助刘邦打败项羽,因功封王。汉初,朝廷直接统治的地区仅十五郡，其余土地都封给了诸侯王，几乎恢复了战国时期的割据局面。不久，汉高祖刘邦采用各种方式，在数年间把异姓诸王逐个消灭。同时又陆续封自己的子侄为诸侯王。需要指出的是，汉初这些同姓王大多是幼童，王国的军、政、财及用人大权都掌握在朝廷派去的官员手中。

吴楚七国之乱后，汉景帝下令改定王国制度，国王权力全部被削去，诸侯的臣属一律由中央任命。皇子受封为王，只食租税，主要是封地内的田租、市税和户赋。户赋按户计征，每户二百钱。食邑千户可得二十万钱，万户可得二百万钱。这些租税都由郡县地方官征收，然后再送交封君、列侯。诸王没有兵权,不管政事,虽有‘ 君国子民 ”之名,但无治国理民之实。

所谓列爵曰封，分土曰建。这时虽有“封建”之名，实际上是“封而不建”,与周代及汉高祖时的诸侯大不相同了。

皇亲国戚历来是荣华富贵的同义词，到了三国时的曹魏则不然,对宗室防范甚严:“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诸王备受猜忌，处境形同囚犯。晋武帝亲眼看到魏禁锢宗室诸王，帝室孤立，司马氏得以夺取曹氏政权的事实。为了巩固皇权，他改变秦汉以来虚封王位的惯例，恢复封土领民的分封制度。各诸侯王有权任命自己王国内的文武官员，希望能以此避免曹魏的覆辙。结果，西晋的八王之乱再一次证明，掌握军政大权的宗室诸王是皇权的致命威胁。

封建社会的中后期，宗室的分封又逐渐从封土（食邑）不领民向不封土、不领民,单纯的食俸制转化。《明史》说:“有明诸藩,分封而不锡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明代的宗室,皇子得封亲王,亲王子得封郡王,郡王子得封辅国将军,以下为奉国将军、中尉。明宗室的俸禄，洪武九年（1376 年）规定,亲王的岁供是米五万石(洪武二十八年,因为国库匮乏,改为万石),钞二万五千贯,锦四十匹,纻丝三百匹,纱一百匹,罗一百匹,绢五百匹,冬夏布各千匹,绵二千两,盐二百引,茶一千斤。还有马料草月支五十匹。朝廷还给王府配置官吏、护卫等人员。这些人的俸饷，也都由国库供给。其余郡王、将军、中尉等宗室成员,也都世世食俸禄。

人类社会的发展，根基于两种生产：一种是物质资料的生产，一种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宗室高官厚禄，锦衣美食，无所事事，对物质资料的生产毫无贡献，只能在大量消耗别人生产的物质资料之后，致力于自身的生产。唐玄宗时，因为皇子年渐长成，在京城安国寺东建造大宅，名十王宅。以后诸孙长

大，又在十王宅旁建百孙院。从十王到百孙，皇族的人口以几何级数在增长。

封建时代，根据“亲亲之谊”，对宗室采取“全包”的财政政策，在历朝开国之初，问题不大。以后岁月荏苒，支庶蕃衍，食口日多，宗藩的俸禄就成为中央财政的一个沉重负担。明洪武十二年（1379 年），封周王于河南。当时在开封，只有一个周王府。百年后，河南有郡王三十九，辅国将军二百一十二，奉国将军二百四十四，中尉不计其数。洪武初，山西只有一晋王府，每年支禄米一万石。到嘉靖时，这位晋王爷的后代已发展成一个 2851 人的庞大团队！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全国每年供京师粮食四百万石，但宗室诸府的禄米开支却要八百五十三万石。也就是说，如果足额发放宗室禄米，京城的官员就要两年不吃饭！御史林润说：“赋税不能增加，但宗室日益蕃衍，思之真令人不寒而栗。”《明史·食货志》指出：“天下之事极弊而大可虑者，莫甚于宗藩禄廪。”然而，这却是封建社会自身的体制所无法解决的问题。

第二节　政府支出

古代社会的政府支出，主要用于维持政权机构的存在。因此，首先要保持强大的军队，其次要有一个官僚群体来贯彻君主的意志，行使权力，统治人民。所以，军政费用在政府财政支出中占有主要地位，而用于发展生产及社会福利的支出则相对较少，教育文化方面的支出更是微乎其微。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政府是社会力量的代表，只有政府能组织各方面的力量，对自然进行抗争，发挥个体小农无法起的作用。但中国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